

论汉赋中的天文星象

张宜斌

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 江西南昌

【摘要】汉赋中使用了较多的天文星象，涉及星宿三十多个，累计出现一百余次。这些星象就其内涵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天文学性质的星象和星占学性质的星象。前者是对客观天体运行规律的反映，主要用来表示时间季节，承担着铺陈描写的文体功能；后者则是将天象与社会人事对应起来，借星象的比附意义来象征帝王宫室建筑、描写天子出行声威、歌颂天子应天受命，发挥着“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文体功能。汉赋中的星占性星象明显居多，这与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盛行，星占学发达，盛行借助天象来宣扬天命王权或天人谴告的时代风尚密不可分。

【关键词】汉赋；天文；星占；铺陈；颂美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0日

【出刊日期】2026年5月8日

【DOI】10.12208/j.ssr.20260190

On astronomical phenomena in Han Fu

Yibin Zh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Abstract】 Han Fu use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astronomical phenomena, involving more than thirty constellations and appearing over one hundred times. These phenomena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based on their connotations: astronomical phenomena and astrological phenomena. The former reflects the objective laws governing celestial movements, primarily used to indicate time and seasons, fulfilling the stylistic function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the latter correlates celestial phenomena with social and human affairs, using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celestial phenomena to symbolize imperial palace architecture, describe the emperor's travels and majesty, and praise the emperor's divine mandate, fulfilling the stylistic function of "proclaiming superior virtue to fulfill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strological phenomena are significantly more prevalent in Han Fu,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astrology, and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using celestial phenomena to proclaim divine mandate and imperial power or divine warnings.

【Keywords】 Han Fu; Astronomy; Astrology; Detailed description; Praise

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天文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天文学作为最早产生的学科之一，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观念形成的理论资源之一，而且对文学创作有着十分明显而直接的影响——天文是文学作品传情达意，体物写志的重要意象之一，因此，从天文的视角来研究古代文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汉赋作为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一种文体，其中就使用了较多的天文星象，这些星象不仅是实现汉赋文体功能的重要媒介，而且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尚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故本文拟从古代天文学的视角对汉赋中的星象做一全面的梳理，并对其

内涵及表达功能做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1 汉赋作家的天文学知识及其所使用的星象

“汉代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黄金时代”^[1]，在天文观测、天文仪器制造、历法制定、宇宙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了《史记·天官书》、《史记·历书》、《汉书·天文志》、《灵宪》、《周髀算经》等一批重要天文学著作，奠定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格局。

汉代天文学与魏晋以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尚未成为官方垄断的禁学，朝廷对于私习天文并无任何限制，人们可以自由研习天文，因此，汉代明天文，通

作者简介：张宜斌，南昌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天象者极多，汉赋作家群体中就有许多精通或熟悉天文者。

在汉赋作家中，精通天文并以天文擅名者至少有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王充、郑玄、张衡、蔡邕等人。司马迁曾“学天官于唐都”，并撰写了《史记·天官书》、《历书》等重要天文著作。刘向、刘歆父子亦是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刘向“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2]。刘歆于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曾向卫将军王涉等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3]，并考订律历，推步日月五星之度，著《三统历谱》。扬雄则“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公。”^[4]在宇宙理论上，信奉浑天说，反对盖天说，撰有《难盖天八事》一文。王充《论衡》中有《谈天篇》、《说日篇》等对宇宙、日月运行、日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衡更是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天文学家之一，“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5]。郑玄曾入太学，师事京兆第五元，精通《京氏易》、《三统历》。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等。

此外，刘安、班固、黄香、刘琬等赋家虽不以天文擅名，但对天文学亦多有涉猎或研究。淮南王刘安曾主持编撰《淮南子》，其中《天文训》一篇，对天文诸问题有较深入的论述。班固曾任兰台令史，“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汉书·天文志》虽出自其妹班昭之手，但《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大量天文现象，因此，他对天文当亦有一定的研究。黄香“知古今，记群书无不涉猎，兼好图讖天官星气律历算，穷极道术。”^[6]刘琬“明占候，能著灾异，举方正不行”^[7]等。

汉赋作家的这一知识背景对他们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他们的赋作中出现了较多的天文星象，使其赋作具有了明显的天学色彩。据笔者统计，在现存的汉赋作品中，所出现的星象有30余种累计100余次^[8]，这些星象可以分为三类：

1.1 恒星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当时所观测的星宿有90余个，恒星500多颗^[9]。到了东汉，这一数量又有了大幅增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10]而汉赋中所出现的星宿多达30余个，遍布于东南西北中五大星空区，其中中宫星宿有北斗（含玉衡、摇光）、北极（含太一）、招摇、玄弋、摄提、玉绳、三台、文昌（含司命）、紫宫、太微、华盖、钩陈等；东宫星宿有角宿、亢宿、房宿（亦名天驷、农祥）、心宿（一名大火）；

南方星宿有井宿、柳宿、天狼、弧矢、鹑火；西方星宿有毕宿、昴宿、奎宿、参宿、伐星；北方星宿有室宿、牵牛、织女、觜觿等。

1.2 行星

太阳系内肉眼可见的行星有金星、木星、水星、土星和火星，汉代对这五大行星的观测已相当细致，对它们的运行周期已有了比较精确的观测和记录。在汉赋中，五大行星均有出现，有时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统称为“五星”，如杜笃《论都赋》：“聚五星于东井”。有时则以个体形式出现，如黄香《九宫赋》：“征太一而聚群神，趣荧惑而叱太白”，荧惑指火星，太白指金星。

1.3 杂星

杂星是指除恒星和行星之外的各种星象，《史记·天官书》中所记载的杂星较多，名目极繁，在汉赋中出现的杂星主要有彗星和流星两类。彗星亦名彗枪，流星亦名奔星。其中，彗星使用较为频繁，累计达11次，流星则共出现了4次。

2 汉赋中的天文性星象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今天所说的天文学有别，它实际上包含了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天文学与星占学两个学科。《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11]，所谓“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就是观测并推步天体运行之规律，相当于现代天文学的内容；所谓“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则是把天象与人事对应起来，根据天象以占卜人事之吉凶休咎，是为星占学。中国古代天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星象兼有天文学和星占学的双重内涵，汉赋中的星象同样如此，亦可分为天文性星象和星占性星象两类。

天文性星象是把星象作为一客观存在的对象，通过长期仔细的观测，掌握其运行规律，并根据其运行规律来安排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汉赋中的这类星象如崔骃的《达旨》：“阴事终而水宿藏，场功毕而大火入。”阴事指冬季，立冬之后，盛德在水，阴气用事，故曰阴事。阴事终则指冬季结束。水宿谓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这七宿冬季可见，但到了春季就沉入地平线以下而不可见，故《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东壁中，季冬昏娄中，孟春昏参中，水星伏藏不见也。”^[12]“场功”，指修筑场地和翻晒、脱粒等农事，时为九月，《诗经·豳风》云：“九月筑场圃”，此时大火星已经坠入地平线之下，故曰“场功毕而大火入”。因此，这里的“水宿

藏”和“大火入”是对天体运行的客观描写。又如张衡的《应间》：“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沍而鼃鼃蛰。”鹑火，指南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中，井、鬼二宿称之为鹑首，柳、星、张三宿称之为鹑火，翼、轸二宿称之为鹑尾。鹑火在三月时出现在南天正中，到了六月时则降到地平线以下，《后汉书集解》：“《礼记·月令》曰：‘季夏土润溽暑’。鹑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当季夏之时，鹑火退于酉。”^[13]因此，“溽暑至而鹑火栖”同样是对柳星张三宿运行的客观描写。

由于天文性星象是对天体客观运行规律的反映，而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可以根据星宿升降隐伏规律来判断时间季节，故汉赋中的天文性星象主要是用来表示时间季节，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昂出于东方。”毕昂指西方的毕宿和昴宿，吕向曰：“毕昂之星，晨见东方，正秋时也。”^[14]因此，这是以毕昂二宿晨出东方表明时为秋季。扬雄的《反离骚》：“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招摇本指北斗七星之摇光，此代指北斗，“招摇纪于周正”表明北斗七星的斗柄正指向周历的正月（周历的正月即夏历的十一月）。

以天文性星象来指示时间季节，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这是古代观象授时的生活智慧的反映；从表达的角度而言，则是以形象的天文来代替抽象的时间，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切合“赋者，铺也”的文体特征。王逸的《荔枝赋》：“角亢兴而灵华敷，大火中而朱实繁”。角亢为东方苍龙七宿中的两宿，角亢出现时为春季，此时荔枝花开满枝头。“大火中”指火星黄昏时分出现在南天正中，时为夏历五月，此时荔枝已经成熟，果实累累。这两句分别以“角亢兴”、“大火中”两种天文来描写“灵华敷”、“朱实繁”两种自然现象，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还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如果将这两句改成“春天灵华敷，夏天朱实繁”，或“三月灵华敷，五月朱实繁”，其表达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又如张衡的《东京赋》：“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銮辂而驾苍龙。”农祥，指天驷，即房星，“农祥晨正”指立春之日。銑曰：“房星正月中晨见南方，农之祥候也，是时土脉润起，可以耕也。”^[15]如果把“农祥晨正”改为立春，表达效果也会黯然失色。

此外，刘琬的《马赋》以彗星颜色之白比喻马尾之白：“尾如雪彗，耳如插筒。”扬雄的《长杨赋》和杜笃的《论都赋》以流星比喻行军速度之快，《长杨赋》云：“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沅沸渭，

云合电发，森腾波流，机骇遽轶，疾如奔星，击如雷霆。”《论都赋》云：“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均是以天体的视觉特征为喻，亦为天文性星象。从表达的角度而言，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描写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3 汉赋中的星占性星象

与天文性星象内涵迥异的是星占性星象。星占性星象是把星象和社会人事相比附，认为星象和社会人事之间具有联动效应，星象的异动必会出现社会人事的异动，同样，社会人事的异动亦会出现星象的异动，所以，可以通过星象预测或占卜人事吉凶，它是原始思维和天人感应思想的产物，是一种非科学的认识活动。

汉赋中的星占性星象较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星象指代地理位置。古人为了星占，将天上星宿与人间地理区域对应起来，称之为分野。扬雄《蜀都赋》云：“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按地纪，则《宫奠位》。”井络指南方七宿之井宿，此代指蜀地。章樵《古文苑》注引《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言东井主蜀分野，岷山上应天象，其精储为井星之维络。”^[16]杜笃《论都赋》：“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班固《两都赋》：“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张衡《西京赋》：“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以井宿代指秦地。张衡《东京赋》：“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以参宿指代河北之地，光武帝刘秀“初为更始大司马，讨王郎于河北，北为参虚分野”^[17]。这些赋中的井宿、参宿都是典型的星占性星象。

汉赋中的星占性星象除了用来指代地理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借用星象的神秘比附意义来表达对帝王的歌颂或赞美，从而实现其“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文体功能，具体而言，它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这一功能的。

3.1 以星象比附宫室建筑

班固《西都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焕若列宿，紫宫是环。”太紫指太微和紫宫，“仿太紫之圆方”意谓西汉都城长安的宫殿建筑乃是模仿太微和紫宫而建，为何要“仿太紫之圆方”呢？因为它们们在星占学上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淮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18]而太一是天上最尊贵的神，《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19]因此，汉代都城的这种模仿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人间帝王之宫殿乃是天帝宫

殿在人间的投影,言外之意,人间天子也就是天帝的化身。通过这种比附,无形中歌颂了帝王的神圣性。又张衡《西京赋》:“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汜。”牵牛指牵牛星,即河鼓星。织女,指织女星。李善引《汉宫阙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张铣曰:“立牵牛织女之象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20]因此,这一模仿同样意在表明昆明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池塘,而是人间天河!其用意与“仿太紫之圆方”如出一辙。

3.2 以星象描写天子之行

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天子田猎时写到:“天子乃驾雕辇,六骏駉,戴翠帽,倚金较,璇弁玉纓,遗光儵爚,建玄弋,树招摇,栖鸣鸾,曳云梢,弧旌枉矢,虹旂蜺旒,所交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赋中使用了玄弋、招摇、华盖、北极(华盖承辰之辰)、毕宿等星象。这些星象显然不是客观的天文性星象,而必须要从星占的角度去理解。“建玄弋,树招摇”,薛综曰:“玄弋,北斗第八星,名为矛头,主胡兵。招摇,第九星,名为盾,今卤簿中画之于旗,建树之以前驱。”^[21]因此玄弋和招摇象征的是矛和盾。华盖指华盖星,辰,指北极。“华盖承辰”本来描写的是华盖星笼罩在北极星之上的天象,但此处是指天子安坐于华丽的车盖之下。因为,在星占学上,华盖指天皇大帝之车盖,《晋书·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护大帝之座也。”北极则是天帝之象征。“天毕”指西方白虎七宿之一的毕宿,《史记·天官书》:“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22]此用以比喻天子所用之狩猎工具。因此,这一系列星象均是取其星占学内涵来比喻天子之出行,其目的在于将天子比拟为天帝,歌颂天子的权威与神圣性。

汉赋中这类描写还有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和《羽猎赋》。《甘泉赋》在描写汉成帝前往甘泉宫时写到:“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招摇指氐宿之招摇星^[23],泰阴指房宿^[24],钩陈指紫微垣的钩陈六星。在星占学上,招摇象征天帝之矛,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25]房宿象征天帝之马,《诗记历辰》曰:“房为天马,主车驾。”^[26]钩陈则是护卫将军,巫咸曰:“钩陈,天子护陈将军。”^[27]因此,在这里汉成帝俨然成了天帝的化身。《河东赋》在描写汉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时写道:“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輿,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旂,矍天狼之威弧。”《羽猎赋》在描写汉成帝田猎时写到:“櫜枪

为闾,明月为候,荧惑司命,天弧发射,鲜扁陆离,骈衍佻路。”其中的星象也都是以其星占学意义来将汉成帝比附为天帝,从而达到歌颂的目的。

3.3 以星象颂美天子受命

扬雄《长杨赋》:“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杜笃的《论都赋》称光武帝:“推天时,顺斗极,排闾阖,入函谷。”赋中的斗极指北斗和北极,但它们不是天文性的北斗和北极,而是星占性的斗极。在星占学上北斗和北极均是帝王的象征,《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28]《春秋纬元命包》曰:“斗为帝令,出号布政,授度四方,故置辅星以佐功为,斗为人君之象,而号令之主也。”^[29]《孝经纬》曰:“德至天则斗星极明,甘露下。”《黄帝占》曰:“极星盛,人君吉昌,不明人君耗。”可见,顺斗极是帝王受命的重要天象依据,故《文选》引《雒书》曰:“圣人受命,必顺斗极。”^[30]扬雄和杜笃在赋中均借“顺斗极”这一天象表达对帝王受命的歌颂。

杜笃《论都赋》云:“高祖有勲,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五星聚于东井就是古人所说的五星聚舍或五星连珠天象,这本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天文现象,但在星占学中,却被视为一种难得的吉祥天象,是天子受命的重要依据,《海中占》曰:“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31]“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32]据史书记载,汉高祖初入关中之时,就有五星聚于东井的祥瑞之象^[33],被视为是秦灭汉兴的天象依据,所以杜笃借之表达对高祖受命的歌颂。五星亦称五纬,五星连珠,亦称之为“五纬相汁”,张衡《西京赋》:“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亦用这一天象歌颂高祖受命。

4 汉赋星占性星象与汉代的星占学

在汉赋所使用的两类星象中,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表达功能而言,星占性星象都更值得关注。就数量而言,星占性星象远远多于天文性星象;就表达功能而言,星占性星象更契合汉赋“宣上德以尽忠孝”的颂美功能。更重要的是,星占性星象反映了汉代的时代特征,它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流行,星占学发达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天人感应思想萌芽于先秦,成熟于汉代,尤其是经过董仲舒的系统性总结和创造性改造,将其构建为一

个逻辑完备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有汉一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天人感应思想的核心是天命王权和天人谴告。天命王权在于宣扬王权神圣性，即为王权的合法性寻找天命的依据，而天人谴告则是以天降灾异的形式对王权加以适当的限制。无论是宣扬天命王权，还是表达天人谴告，天文星象都是最重要的话语资源之一，所以，汉代星占学极为发达并广为流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星占成为最具效力和最有说服力的言说方式之一，上至帝王，中到大臣，下至平民，都以星占作为自己表达政见的重要依据。如汉宣帝就以五星出东方以及太白出高的星象作为命令赵充国出兵的依据：“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34]至于大臣利用天象作为表达政见的更是比比皆是。如汉哀帝时李寻以五星失行作为劝谏哀帝“诛放任人，防绝萌芽，以荡涤浊藏，消散积恶”的主要依据：

臣闻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应王者号令为之节度。岁星主岁事，为统首，号令所纪，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为，未得其节也。又填星不避岁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娄，当以义断之。荧惑往来亡常，周历两宫，作态低昂，入天门，上明堂，贯尾乱宫。太白发越犯库，兵寇之应也。贯黄龙，入帝庭，当门而出，随荧惑入天门，至房而分，欲与荧惑为患，不敢当明堂之精。此陛下神灵，故祸乱不成也。荧惑厥弛，任巧依势，微言毁誉，进类蔽善。太白出端门，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时解，其忧凶。填、岁相守，又主内乱。宜察萧墙之内，毋急亲疏之微，诛放任人，防绝萌芽，以荡涤浊藏，消散积恶，毋使得成祸乱。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盖皇天所以笃右陛下也，宜深自改^[35]。

东汉郎顛亦以以荧惑失行批评汉顺帝淫于女色，多蓄宫人，以致“皇胤多夭，嗣体莫寄”：

臣窃见皇子未立，储宫无主，仰观天文，太子不明。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余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

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惟陛下丁宁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贵幸，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36]。

甚至平民亦以星占来表达政见，汉桓帝时襄楷就以星占批评“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并为忠臣刘瓚、成瑨等鸣冤：

“臣窃见去岁五月，荧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门，不轨常道。其闰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动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今年岁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门，还切执法。岁为木精，好生恶杀，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诛罚太酷。”^[37]

由此可见，星占确实是汉代表达政治意见最重要的言说方式之一，得到了朝野普遍的认可，因此，作为“润色鸿业”、具有鲜明政治话语色彩的汉赋用星占性星象来颂美帝王正是这一时代风气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反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星占性星象在汉赋中的运用与星占学在政治中的运用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星占学在政治上主要是用来表达对政治的批评，它主要是用灾异性天象来表达对帝王的批评和劝谏，而在汉赋中，则主要是以星占性星象表达对天子的歌颂与赞美，以异常天象表达对天子讽谏的则较少，似乎仅见于刘歆的《遂初赋》，其云：“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太阶，指三台，《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曰：“太阶者，天之三阶也。……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38]又李善注引韦昭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岁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谓太平。”“太阶侈阔”则指三台色不齐，以此批评哀帝时，三公外戚擅权，君臣失和，政见不一。机衡与魁杓均指北斗，斗为帝车，象征天子的号令，“机衡为之难运”则批评哀帝政令不畅，难以贯彻执行。汉赋星占性星象的这一

特点,当与赋体“劝百讽一”,以颂为主的文体特点有关。

参考文献

- [1]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5页
- [2] 班固:《汉书》卷36《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3页.
- [3] 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84页.
- [4]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
- [5]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1898页.
- [6] (东汉)刘珍等撰,吴广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763页.
- [7] 范晔:《后汉书》卷八七,中华书局,1965年,1858页.
- [8] 这一数据仅限于现存的汉赋,且不包括最常见的天体日月,可能远远低于实际使用情况.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西汉时期的赋作就高达940篇,东汉时期的赋作更为繁荣,其数量自不会低于此数,因此,两汉时代的赋作当有2000篇左右.而现存的汉赋仅有二十分之一,据费振刚等所辑《全汉赋》,仅有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的约100篇.
- [9]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认为《史记·天官书》记载星官91个,恒星558颗.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则认为记载星官92个,恒星552颗.
- [10] 张衡:《灵宪》,《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 [11]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523页.
- [12]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4-1715页.
- [13]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1905页.
- [14]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第295页.
- [15]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第73页.
- [16] 章樵注,钱熙祚校:《古文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9页.
- [17]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第66页.
- [18]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200页
- [19]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290页.
- [20] 《六臣注文选》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54页.
- [21] 《六臣注文选》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55页.
- [2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05页.
- [23] 古天文中的招摇星有二,一是指北斗七星之摇光,《礼记·曲礼上》:“招摇在上.”孔颖达疏:“招摇,北斗第七星.《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七摇光,一至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摇光,即招摇也.”二是指东方氐宿之招摇,亦名天矛.《史记·天官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
- [24] 张晏曰:“太阴,岁后三辰也”,指太岁,似不确.泰阴当指房宿,《石氏星经》:“房南二星间为阳环,其南曰太阳道;北二星间为阴环,其北为太阴道.”
- [2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294页.
- [2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296页.
- [27] 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卷67,常秉义点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83页.
- [28]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291页.
- [29] 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76页.
- [30]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页
- [31] 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常秉义点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 [32] 班固:《汉书》卷26,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7页.
- [33] 据刘金沂研究,由马王堆帛书记载可知,其时岁星和填星确在东井,但其他三星不在,十月之后,即公元前205年7月,五大行星才大体同时出现在东方.
- [34] 班固:《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81页.
- [35] 班固:《汉书》卷75《李寻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86-3187页.
- [36] 范晔:《后汉书郎顛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1-1062页.
- [37] 范晔:《后汉书·襄楷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6页.
- [38]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51页.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 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